觀海堂藏書點滴

井上進

楊守敬是晚清學者，亦是書法家、藏書家，而其作爲藏書家的成就，與他以駐日使館隨員身份居留日本的經歷有密不可分的關係。也就是說，作爲藏書家，或目錄、版本學者的他，是在外國日本入其門而深造，遂至自成一家的，而此經歷就是他與眾不同的獨特所在。在此介紹的觀海堂藏書，即可謂是表現他此種獨特性的實物，或可謂是產生此種獨特性的原因。

現藏在國立故宮博物院的觀海堂藏書，如今恐怕無庸絮說，是晚清學者楊守敬的部分收藏，即楊氏去世後被政府採購的其藏書中，除去撥交松坡圖書館的「十之五六」（後歸北京的國家圖書館庋藏）以外的部分，據悉總共有一千六百多部，一萬五千多冊。若只從其數量來講，這批古籍並不顯眼，但如眾所知，其中的精華都是楊氏在日本透過與當地第一流的收藏家、版本學家的交往搜求而得的，因此其自然有別於一般的藏書，具備獨自的特徵。袁同禮早在《故宮所藏觀海堂書目》（民國二十一年）的序文中就如下寫道：

> 竊念此目雖非觀海堂藏書之全部，然所著錄，爲其他書目所不及者有二：一曰古抄本，二曰醫書。日本所傳古抄本，多存隋唐之舊，其價值當出宋元舊刊之上，今歸然獨存，而爲一般收藏家所未見。至醫籍秘本，大抵皆小島學古（名尚質，醫官）舊藏，學古三世以醫學鳴於日本，藏書之富，罕有其匹。今觀其所收者，多爲各書目所未載，甯非書城之巨封，文苑之寶藏耶？

袁氏提到的如此特徵，楊守敬自己當然也很清楚。據《日本訪書志．緣起》所言，他作爲駐日使館隨員到東京就任後第二年，即光緒七年就已經了解到「日本古抄本…大抵根源於李唐，或傳鈔於北宋，是皆



楊守敬觀海堂藏書選介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一　《北溪先生性理字義》　元刊本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我國所未聞」，同時也認識到「日本醫員多博學，藏書亦醫員爲多，…故醫籍尤收羅靡遺。」不僅如此，他還用其敏銳的眼光發現「日本頗多朝鮮古刻本」，「有彼國習見而中土今罕遇者，又有彼國翻刻舊本，而未西渡者」，於是與宋元明版、古寫本一樣，這種善本書也被其盡力搜集。總而言之，觀海堂藏書是楊守敬「日本訪書」的實物成果，因此從這一點來看，確實與「一般收藏家」的藏書頗有不同。

觀海堂中不乏「海外異書」、「驚人秘笈」，若要介紹其全貌並不容易，坦率地說，已非筆者所能勝任。因爲故宮所藏的一千六百多部中，到現在爲止，筆者只能調查到其極少的一部分，而且作爲觀海堂藏書一大特徵的「日本所傳古抄本」，由於筆者目前沒有研究上的需要，因此並未對其查閱過。儘管如此，管窺所及尚有不少善本，的確具備觀海堂藏本的特徵，且有很高的學術或文物價值。又有其中一些，僅從欣賞的角度看也很值得一談，對於此種書，我們無須故作學究態，可以用更輕鬆的態度去享受。那麼現在就把這一寶藏中的若干善本書介紹給讀者，以作打開觀海堂的門把吧。

首先要介紹的是元刊本《北溪先生性理字義》。（圖一）這一版本，一看就知道純係元代建本風格，其字樣也與在明初刊本上往往見到的呆板、不整有所不同，倒讓人覺得與宋版相通。實際上，從以下幾點確實可以推斷此本源自宋版，如文中避「讓」字作「遜」，「貞」字也有時缺末筆（卷上「仁義禮智信」條），以及「我朝范忠宣公」的「朝」字上空一格（卷上「忠恕」條）。這是因爲「讓」是英宗的父親濮安懿王的諱字，「貞」是仁宗的嫌諱，而空格則無非是由將宋朝視爲「我朝」的人所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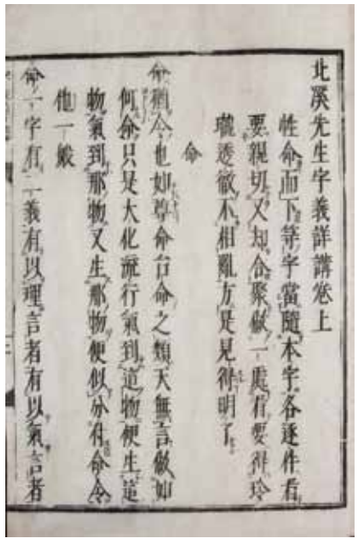
在版本系統上可推斷爲直接宋版，也就意味著這一版本的文字應該有不可忽視的價值，很可能保留其本來面目，而此觀海堂藏本《字義》的文字確實有其優異之處。在這裡，雖然無法、恐怕也沒必要一一介紹其具體的例子，但如卷上「性字」條的「在鼻能嗅」一句，只有此元刊本的文字才是正確，而中國通行諸本將其寫作「在鼻能浥」，就有些莫名其妙了。此外，此本的結構與中國通行諸本大有不同，而在通行本裡也有出現的陳淳序有云「凡二十有五門」，亦只符合元版系統。就是說，此元版



圖二　《北溪先生性理字義》　朝鮮嘉靖刊本
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



圖三　《北溪先生性理字義》　日本寬永刊本



圖四　《北溪先生字義詳講》　日本寬文刊本

《字義》是在我們目前所能見到的諸多版本當中最古的海內孤本，且其文字也極爲值得重視。

此本在中國絕跡，只在日本流傳下來，這一事實似乎並不全部是偶然所致，而有其所以然，或者有其一定的背景。在中國，整個明代前半期的學術非常貧乏，顯得極其單調，連程朱理學的經典著作—沒被簡化、通俗化的原本—也很少有人讀、很少被出版。但到了明代後半期，學術界發生了急劇的變化，出版界也呈現出空前的盛況，而這種變化是隨著士人對正統之學程朱理學信仰的巨大動搖、甚至是衰弱而產生的。然後到了清代，雖然程朱作爲正統思想仍舊爲國家所尊崇，但在士人社會裡，對它的信仰卻一直在低迷。

然而在日本，正與中國相反，自從相當於明末清初的十七世紀以來，程朱理學開始被學術界積極地學習，廣泛地接受，因而其權威也逐漸達到了極點。觀海堂的這一套，由其朱點、藏印來看，似可定爲室町末到江戶初的時候，大概在十六世紀後半期傳入到日本，之後在整個江戶時代，一直爲學者所閱讀和愛惜收藏。

在日本通行的《北溪字義》雖然不是直接用元版翻刻的，但與元版同屬一個系統。首先，元和四年（一六一九）或稍早一點，有人根據朝鮮嘉靖三十二年刊本《北溪先生性理字義》出版了木活字本，然後到了寬永年間出現了以此活版爲底本的坊刻本（圖二、三），再到寬文年間，又有了加註釋的另外一個版本，這樣寬永和寬文的兩個版本在社會上廣泛地流傳開來。日本通行的《字義》的祖本是與元版同一個系統的朝鮮刊本，這一事實可謂有趣，頗值得注意。衆所周知，自明代以來，在朝鮮只有程朱才是一定要認眞學習、信仰的正統，其他流派在讀書人當中從來沒有獲得過相當的勢力。曾經的朝鮮可以說是程朱的王國。

日本的通行本《北溪字義》，其實還有一本，就是寬文八年（一六六八）翻明正德三年壽藩刊本《北溪先生字義詳講》。（圖四）上述的《性理字義》應該源自嘉定刊本，而此《詳

講》則根據淳祐刊本，所以兩者之版本系統雖然各不相同，但都淵源有自，保留著《字義》的原貌。

在日本廣泛流傳的兩個系統的《字義》，都有從宋版繼承下來的本文，其文字之優是不言而喻的。但在中國，通行本只有一個相對混亂的版本，即爲可能根據傳鈔本刊刻的弘治五年浙江參政林同刊本《北溪字義》這一系統。（圖五）特別是道光二十年刊惜陰軒叢書本，一個相當忠實地翻刻弘治版的通行本，近代以來幾乎被奉爲定本。目前最容易利用的《字義》，應該是中華書局理學叢書本《北溪字義》（一九八三年出版，二〇〇九年重印），而其底本是弘治



圖五　《北溪先生字義》　明弘治5年浙江參政林同刊本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六　《脈經》　多紀元昕手題　日本傳鈔朝鮮刊本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圖七　《脈經》　日本傳鈔朝鮮刊本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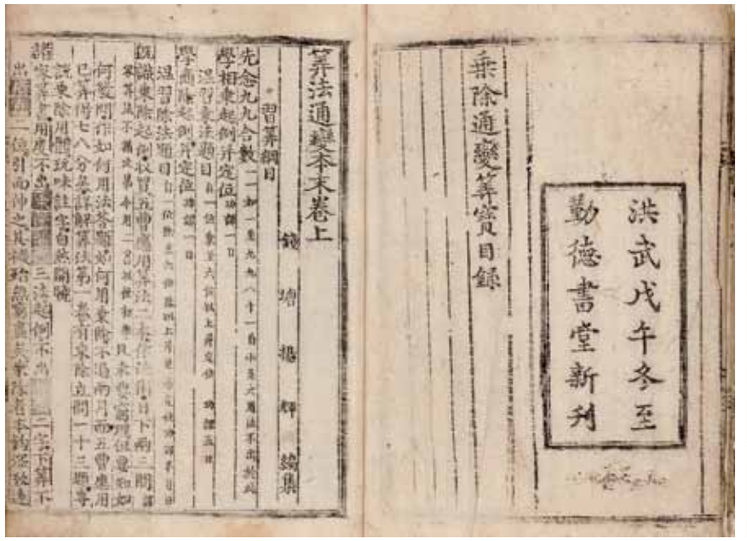
理學的古典著作，於是《字義》也被再刊，出現了弘治本，還有了根據宋版的正德本。但在中國，士人對程朱的信仰逐漸衰弱，始終沒能恢復其往日的威信，以致沒有人認眞探討《字義》的版本問題。難得出版的翻淳祐本《詳講》也沒有受到特別的注意，漸漸埋沒，遂至流傳不絕如綫，如今似乎只有一本，即應爲清季朱氏結一廬所收藏過的一本，藏在上海圖書館。「禮失而求諸野」，筆者雖然不大認同中華思想，但《北溪字義》流傳的情況，不覺令人想起這一句話。

對日本的學者來說，朝鮮本一直與中國本一樣是「舶來」的珍品。到了十八世紀以後，他們也開始明確意識到朝鮮本的版本價值，於是乎或在出版某一種古籍時，特將朝鮮本選定爲底本，或在學者之間，積極地互相借閱、傳鈔。《日本訪書志》著錄爲「影鈔元刊本」的《脈經》，其實與元版沒有直接的關係，只不過是後者的實例。

這本《脈經》，楊氏謂其底本是泰定四年刊本，然後竟云「成化十年畢玉重刊此本，則訛謬尤多」（《訪書志》九），但這應該是他爲了自詡其藏本的精善，故意裝糊塗的。此書的末尾明明有成化十年畢玉書後，不容置疑地表明此書絕非傳鈔泰定本。因此當初故宮也據楊氏原題著錄爲「日本影鈔元泰定本」（《觀海堂書目》），但後來察覺其誤，糾正爲「影鈔成化本」，現行的館目也仍此審定。但是，此本之所據並非眞正的成化本。

要知道這一點，並不需要什麼特別的鑒識，只要一看此書的末尾，在畢氏書後後面的多紀元昕手題就可以了。因爲在這裡，多紀氏先用墨筆寫了「文政甲申（七年，一八二四）孟秋，借鈔寮友越子棟〔隆〕懷仙閣／所藏朝鮮國刊本」兩行，接著又用紅筆寫了「文政甲申孟秋十又八日校訖，元昕」一行，然後用藍筆寫了「天保甲辰（十五年，一八四四）季秋念三日夜二更，從宋槧史記扁倉傳大永間僧幻雲附標／所引成化原刊本，藍筆校過，元昕」兩行。（圖六）

多紀氏所謂的「越子棟〔隆〕懷仙閣」，應該是同爲幕府（德川政府）醫官的曲直瀨氏的藏書樓。因爲



圖八　《宋楊輝算法》　封面與牌記　明宣德8年朝鮮慶州府翻刊洪武11年余氏勤德堂刊本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《經籍訪古志》（楊守敬的朋友森立之等撰，是楊氏訪書時的指南書）著錄了不少「曲直瀨氏懷仙樓藏」善本，而且由元昕、其父元胤和其叔元堅等多紀一家人所編的《補遺・醫部》，將「懷仙樓」稱爲「懷仙閣」。附帶一說，收於《古逸叢書》的北宋本《姓解》，與其他許多所謂的「北宋本」不同，是經由高麗國傳入日本的眞正北宋本，就是曲直瀨氏懷仙樓所舊藏的。

再說這裡所謂的「越」，是「越智」的簡稱。據說十八世紀的曲直瀨氏宗子正珪，相較於醫學更喜歡儒學，姓稱越智，其文集則名曰《懷仙樓集》。由此可知，這本《脈經》不外乎是多紀元昕請江戶醫學的同事越智（曲直瀨）隆，借用家傳的朝鮮翻成化刊本傳鈔的。楊守敬云「日本頗多朝鮮古刻本」，「日本醫員多博學，藏書亦醫員爲多」，看來可不是虛言也。

關於多紀元昕傳鈔的《脈經》，這裡再要談談其藏印。此書鈐印只有他祖父元簡的「聿脩堂」印、父親元胤的「弍字奕祺」印等，而沒有元昕自己的藏印，這一點也讓人覺得稍爲奇特，但更有意思的是「白飯充腸聊當肉，好書到手不論錢」這一顆閒章。（圖七）此章印文固然傳達了藏書世家代代相傳的書癡氣氛，但其文字也讓人感覺到一種詼諧味，似乎與中國藏書印之風格稍有不同。

> 日本人的愛書趣味，似乎都比較中國的藏書家更有人情味，更有風趣。小島尚質的「父子鐙前共讀書」，瀧澤馬琴的「不行萬里路，即讀萬卷書」，市野迷庵的「子孫換酒亦可」，大槻磐溪的「得其人傳，不必子孫」，都有一點風流的瀟灑趣味。

葉靈鳳曾經如此說道，「風流的瀟灑趣味」被認爲是日本藏印的特徵（《讀書隨筆三集—藏書印的風趣》，三聯書店，一九八八），似乎還是有所說中的。之所以產生這樣的不同，暫不在此詳談，但不管如何，觀海堂藏書的精華都是來自日本的，因此連藏印這樣的細節，也往往帶有或多或少的日本風味。



圖九　《皇元風雅》　日本南北朝覆刊余氏勤德堂本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觀海堂中值得一提的書還有很多，如果條件允許的話，很想再介紹其中幾種，但限於篇幅，現在只能特舉一部與讀者共享，就畢小文了。

這一部就是朝鮮宣德八年慶州府翻洪武十一年勤德書堂刊本《宋楊輝算法》（書名暫依封面，又「楊」字原作「揚」）。《日本訪書志》將此書與陸心源藏毛氏汲古閣鈔本（日本靜嘉堂現藏）、宜稼堂叢書本相比，誇其精善，但因前者爲影鈔元刊的精鈔本，所以從內容上看，勤德書堂本是否優於毛鈔，是目前無法斷言的。

在這裡要討論的是此書的招牌文字。此書開頭附有封面，而其天頭以匾額式記「古杭勤德書堂」六字，書中又有木記，記有「洪武戊午冬至，勤德書堂新刊」，「古杭余氏勤德書堂刊行」等字樣，若是相信這些文字，勤德書堂當然是杭州的書坊了。但問題在於：在明代前半期以前，除了建陽坊刻本，從來沒見過有封面的書。此外，無論封面上堂名的記載方法、將陰刻的「新刊」兩字夾在花魚尾之間的設計，還是在卷端的書名用大字占雙行寫，行款又爲十六行二十五字的密行細字的版式，按照常識來判定，無非是建刊的，而絕不會是浙刊的特徵。（圖八）

勤德書堂這家坊肆出版活動的痕跡，其實在觀海堂的另外藏本中還能見到，十四世紀後半期在日本刊行的所謂「五山版」《皇元風雅》就是其例。它的後集姓氏末有「古杭勤德書堂謹咨」的告白木記，但其版刻還是很明顯的建刊風格，雖然因爲是日本的覆刻，刻得稍爲笨拙。（圖九）

另外，筆者能見到的勤德堂本還有一個例子，即日本東京大學藏元末明初刊本《古今歷代十八史畧》。這一本也附有與《算法》設計相似的封面，在天頭以匾額式記「勤德書堂刊」五字，本文爲十五行二十六字的密行細字，字樣又是頗爲粗拙的匠體，從如此特徵來看，此書之爲建刊是不容置疑的。

總而言之，朝鮮刊本《算法》的底本應該不是杭州的，而是建陽的。就是說，坊刻本所號稱的「古杭」、「京本」等招牌文字完全是靠不住的。這雖然可謂是一平凡的事實，但流傳至今的元代到明初刊本爲數不多，所以也有可能上此種假話的當，以致被誤導而主張在元末至洪武時期的杭州，出現了不少帶有封面的坊刻本這樣的謬說。日本「翻刻舊本」或「朝鮮古刻」等「海外異書」，不單是少見，其資料價值也是相當大的，想必讀者諸賢也能領略到這一點了吧。

作者為日本名古屋大學教授